

Research on Female Images in Early Chinese Film Communication in the Memory of May Fourth Movement

Yuqian Shen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the first major social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a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it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and cultural landmarks in 20th century China. Movies have entered China as a new medium in this era.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was a crucial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 laying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China.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rms of media,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films basically kept the same pace with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image of women in early Chinese films became an important mapping for the mass dissemination of the May Fourth Ideology. In this paper, we analyse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early Chinese films and discuss the dissemination of female image in early Chinese films under the May Fourth Thought.

Keywords

May Fourth Movement; early Chinese films; female image

五四记忆中早期中国电影传播里的女性形象研究

沈誉倩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启蒙运动，它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史的伊始，是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地标之一。电影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一种新媒介走进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女性解放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后续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电影作为最重要的媒介形式之一，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与新文化运动基本保持一致步调，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成为五四思想大众化传播的重要映射。论文通过对中国早期电影传播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对五四思想下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思想传播展开讨论。

关键词

五四思想；中国早期电影；女性形象

1 引言

中国近现代电影的发展与五四思想的发展传播紧密相连，电影业的发展受益于五四精神的弘扬，电影界自觉普遍自觉地吸纳和宣扬五四精神，并直接地承担着传播启蒙思潮的责任^[1]。但同时由于电影行业本身的商业性限制，其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带来了电影工业与现代思潮的错位尴尬。

与以往的革命所不同的是，“五四运动”中女性问题第一次被纳入了社会改革的话语体系。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为女性解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五四”之初所关注的“人的现代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女性的现代化，女性首次作为一个差异化的形象，被从性别文化体系中单独分离出来作为一个主体，标志之一是现代汉语中“她”的发明^[2]。

【作者简介】沈誉倩（1999-），女，中国四川南充人，硕士，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

“五四”之后，“新女性”成为一种充满现代意味的新文化形象，如1925年章锡琛创办月刊《新女性》；1935年蔡楚生导演的电影《新女性》问世；1935年上海民立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新女性》等。女性问题是“五四运动”的重要课题，也是国产电影热衷表现的重要议题，如《三个摩登女性》中的周淑贞、《国风》中的大姐张兰、《新女性》中的韦明等。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呈现反映出了当时五四新文化思想对于大众女性解放思想的启蒙，交织着一些难以避免的前现代思想和时代政治革命诉求。

2 社会背景

2.1 经济背景

19世纪末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迫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殖民扩张。鸦片战争打响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序幕，尤其是甲午战争失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大片的土地割让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

心,新的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河新航线的开辟,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加速了封建经济的瓦解。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索取巨额赔款和资本输出等方式,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剥削,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与此同时,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萌芽,尤其是在“实业救国”的号召之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薄弱,无法解决社会矛盾。

2.2 政治背景

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推翻这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从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背景下,中国各阶级都在不断做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尝试,“救亡图存”的呼唤成为时代最强音。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国千百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共和政体得以建立,然而革命果实却被帝国主义支持的袁世凯窃取。

西方资本主义无法引领中国走向革命胜利,中国社会急切渴求新的政治思想走向台前引领“救亡图存”。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其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和比较,在实践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2.3 文化背景

中国近代伴随着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明清之际出现了男女平等思想的本土零星萌芽,如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对于封建伦理纲常秩序的否定,和对歧视妇女思想的批判,但这样的思想在当时遭到了社会的打压。零星萌芽的本土近代女性思想并没有认识到压迫的根源,也并没有意识到解放革命的必要性,并没有在中国社会引起太大的波澜。

鸦片战争之后,与西方列强同时走进中国的还有西方的思想文化,“西学东渐”逐渐深入。一系列变革的失败促使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器物 and 制度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受西方文艺复兴启蒙思想的影响,思想的启蒙进入变革视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对封建文化发起猛攻。一场前所未有的意义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展开。

“五四运动”带来了对于“人”的发现,“天赋人权”“人道主义”思想下,个人的独立和尊严得到重视,女性作为传统社会结构中长期被奴役和毒害的一分子,对于女性的“人的发现”问题就是女性解放问题,女性生存现状和解除束缚的路径受到热切关注,女性问题成为变革的焦点之一。以陈

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揭露了女性受到的迫害,并对女性婚恋、贞操、教育、就业、参政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1]。

3 五四思想下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传播

3.1 传播主体——男性主导的思想引领者

尽管妇女解放思潮兴起,但是话语权的掌握主体并没有快速被女性占领,中国早期思想界和电影界长期由男性主导。早期电影女性形象的刻画往往经由男性之手,其传播主体主要是男性思想家和男性电影人。

一是男性思想家。由于受教育权利、参政权力、社会话语力量等方面的不对等,近代中国妇女问题的讨论中声量更大的是男性思想家,女性问题难以避免地被置于男性权力框架下而展开,呈现出一定的工具性特征。如维新派很早就对女性解放做出了尝试,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女学报》,其目的却是为了培养“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贤妻良母,依然将女性角色局限于家庭,而非解放女性投入社会建设的进程中^[4]。女性议题的讨论成为其背后家国政治革命开展的手段和工具。

二是男性影人。电影工业中,男性影人占据了重要的主导地位。许多早期影人是在留学欧美时,在西方银幕中遭遇了妖魔化和丑陋化的中国人形象,愤而从影^[5]。早期中国电影“双父”——郑正秋与张石川是早期中国影人的重要代表,他们合作的重要作品《孤儿救祖记》是中国电影文化的奠基作品之一,然而其中苦情贤良的女主形象无不包含着男性对女性角色的目光投射。

当然男性引领人的探索中国早期电影中也诞生了许多优秀的现代女性形象,如《自由神》中的陈行素等。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左翼电影,如《女人》《姊妹花》《神女》等作品,闪现出了更耀眼的现代色彩。

3.2 传播渠道——电影

电影是一种叙事性极强的艺术形式,它天然地承担着社会意识形态的传播功能,但是电影同时是一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的企业,第一代影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打开市场、如何生存的问题。为了突破这样的困境,早期影人选择借鉴鸳鸯派通俗小说和文明戏,向通俗文化品位天然地靠拢,与市民阶层的趣味接近^[6]。电影商业性娱乐性的内在规定性,也导致早期电影与思想传播史中的先进思想似乎有所错位,呈现出改良式的色彩。电影的娱乐性也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精英主义的话语,契合了“白话现代主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大众化传播。

中国电影早在1905年就已经萌生,当时的正式名称为“影戏”,更像一种赚钱的杂耍把戏,而非一门独立艺术,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界对电影这门艺术形式予以重视,赋予了电影业现代性的特征,倡导现实主义的电影创作手法,明确了电影现代启蒙的重要功能,并提出了民族电

影的概念,呼吁“到民间去”^[7]。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也推动女性形象走进电影业关注视野,以揭示女性命运、再现女性苦难、关注女性觉醒为题材的电影成为一种重要新题材。

3.3 传播客体——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大众社会

电影是一种通俗文化,其主要传播对象是大众社会,作为普通民众的大众难以做到与先进思想时刻保持一致步伐,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动荡的不安中,无可避免地保留着一些前现代文化接受习惯。电影工业的商业性注定电影生产需要部分迎合受众习惯。

在电影诞生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城市受众都是它的主要观众来源。相较于乡镇居民难以克服技术条件和消费习惯的限制,城市居民是电影产业的消费主力军。城市化的进程已经开始,都市消费文化兴起,以上海为例,上海既有大量的本土市民,又有大量的移民居民,对于他们而言,精神面临社会环境变革的焦虑和漂泊他乡重建社会关系体系的需求,物质上经济能力有所提高,消费文化兴起,电影作为一种消遣娱乐需求进入人们的视野,同时电影也能满足消费者在环境变革中求知新事物的心理。对于城市居民而言,看电影成为一种摩登的娱乐方式。

3.4 传播内容——“新女性”形象

关于女性形象的构建,中国早期电影中不乏恭顺贤良型、恶毒放荡型、江湖女侠型的女性主义形象,但是这些女性形象大多没有跳出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艺的经典女性形象塑造,思想革新力度体现不足,故在这里不展开过多讨论。论文着重关注的是“新女性”形象,“新女性”是“五四”所孕育的最能体现新文化理想的现代女性形象^[5]。

中国早期电影中“新女性”形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新女性”,她们拥有自强自立的品格和勇于反抗的精神。如《三个摩登女性》中的阮玲玉饰演的邱淑贞,抗拒包办婚姻,求学自立,靠自己的劳动所得赡养母亲,拒绝不当的男性追求。这类“新女性”体现出女性的自尊自立,不甘做男性的附庸。

其次是“新装旧里”的“新女性”,带有浓厚前现代色彩的但披着“新女性”外衣的女性形象,以现代思想的外框来装盛前现代思想和文化经验的内里。如《新女性》中阮玲玉饰演的韦明,作为一名新知识女性,毅然离开封建家庭追寻婚姻自由,不料婚变后拒绝了王博士的追求却害她丢了工作,为了支付重病女儿的医药费,不得不同意下海做一夜暗娼,可所遇嫖客竟是王博士,韦明最后不堪苦难,在“新女性”的梦中服毒自杀。当时的社会没有为韦明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韦明毁灭性的结局也体现了对女性贞操问题的死守。

最后是虚假的“新女性”,不少影人误解了“新女性”的内涵,只接受了启蒙的表象,以放荡或爱欲视为最高角色理想塑造。如《现代一女性》中疯狂追求爱情刺激的蒋葡萄、《女儿经》中表面鼓吹妇女运动背地过着奢侈糜烂生活的高华、《三个摩登女性》中不顾一切追星寻爱最后自杀殉情的陈若英等。

这三种类型中,很可惜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新女性”出现并不多。“新女性”同时作为思想解放的主体、男性凝视的客体、政治变革的载体置身于早期中国电影传播中,带有矛盾性色彩。

4 结语

电影作为一种叙事功能极强的艺术形式,是承载社会意识形态的良好媒介形式,也是五四政治文化革命的一项激进载体。女性作为历史上被长期奴役的底层群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妇女解放思潮中,女性形象终于获得关注、获得被正确认识的自由。具有现代启蒙精神的中国早期电影中,女性的命运成为重要的编导内容。但是,女性形象并不总是现实的反映,而常常是理想化凝视的投影,女性群体被内部分裂。如《新女性》中的阿英,她除了有一具女性身体的躯壳外,毫无任何女性的特质,是影人塑造的过于理想化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表面的女性思想背后是男性话语的政治诉求。同时,虽然此时的中国早期电影已经初具现代型特征,但是这些电影的数量相较于整个电影产业依然十分渺小,中国电影界此时的主流依然是“怪力乱神”的娱乐片。尽管如此,在早期电影作为一个新事物传入中国的探索阶段,新旧交织的形象探索是正常的,虽然体现出改良主义色彩,但是电影为改变女性刻板形象,推动五四文化思想走向大众化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史博公,吴岸杨.早期电影与“五四精神”互动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电影社会学视角的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5):92-97.
- [2] 戴锦华,孙柏,杨焱莹,等.“文化革命”“女性”的发明和中国电影——戴锦华谈“五四与电影”[J].电影艺术,2019(3):15-20.
- [3] 尹静.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伦理思想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4.
- [4] 章文颖.“中国式”启蒙的无声荧幕书写——论五四启蒙话语下国产无声电影中的女性形象[J].中国美学研究,2017(2):258-281.
- [5] 戴锦华,钟大丰,王志敏,等.“五四”记忆中的精神与电影[J].电影艺术,2009(3):5-10.
- [6] 李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女性形象的叙述与展示[D].上海:复旦大学,2005.
- [7] 贾冀川.现代启蒙精神与现代中国电影[J].社会科学,2009(11):170-179+192.